

导 论

发展观的变革与中国小康社会

在当今世界上，发展问题已经成了人类跨世纪的时代主题。

然而在人类即将告别 20 世纪 准备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 发展问题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人口爆炸、资源危机和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威胁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巨大障碍。

面对这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发展道路、发展观进行反思 发展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应当选择何种发展道路 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人们认识到，必须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创新 确立新的发展观。

发展是一个既年轻而又古老的问题。发展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应运而生的。它最早产生于重商主义时代，当时，拜物观念占据了所有经济思想家的头脑，他们都认为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可以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此后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数世纪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约翰·穆勒、马歇尔、熊彼特、李斯特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阐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

除此之外 在 19 世纪 欧洲还涌现出一大批社会学家 如马克

斯·韦伯、迪尔凯姆、斯宾塞等人 他们从社会变迁的角度 分析和研究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等有关发展问题，并形成了许多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的发展思想。

在 19 世纪，发展思想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 注重以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来解放生产力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学说 发展的目标 从社会角度讲 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民主；从经济角度讲，是生产力的大跃迁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 从人的角度来说 就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即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流派与理论构成了发展研究的先趋。发展研究的崛起 把发展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而且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角度来加以分析和探讨 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有关发展的理论，这种尝试应该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 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开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战后时期 欧洲与日本等地的复兴和重建 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形成了发展问题成为世界中心主题的客观背景。随着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 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分支学科相继诞生 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相继问世。试举数例为证。

1970 年，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从而完成了他于 1960 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六阶段说。

1972 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由丹尼斯·米都斯主持的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 对西方的追求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该报告指出，用倍增的速度去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 必定会使社会在物质和能源方面达到极限 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1973 年 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74 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

1975 年，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发表研究报告《另一种发展》。

1976 年 巴里洛克基金会发表题为《是灾难还是新的社会？》，提出巴里洛克模式。

1977 年，里昂惕夫等发表联合国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的未来》。

1979 年 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北方和南方 争取生存的纲领》。

1981 年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一书中 首次从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出发 提出我们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82 年，法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弗朗索尼·佩鲁发表《新的发展观》 指出人的发展、人口、卫生、保健、体育、教育、生态是发展的目的和中心 市场是为人而存在的 而不是人为市场而存在 资源和产品能否合理分配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上。

从战后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

从发展理论的视角来看，发展研究从以西方传统模式为中心，逐渐转变到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中心，或者在世界发展模式 中比较重视这些国家的因素。从独立的国别发展研究逐步转到世界性的发展研究 许多世界性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从研究发展的国内条件转为研究发展的国际背

景、历史进程等综合性因素的分析。

从发展的主题角度来看 战后 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 围绕着发展的主题和中心问题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例如 有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战略，有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有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等等 这些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与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发展认识的深化与逐渐成熟，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意愿。英国社会学家布兰特综合各家发展理论认为 发展是社会有意识的逐渐走向科学化和成熟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既定估计可行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

从发展观角度看 自 50 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 从单一的发展到多元化综合的发展 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 从经济的发展到社会的发展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到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等。这种种转变 实质上 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从以物的发展为中心逐渐转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也随之发生转化。各国发展的道路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则经历了一个从盲目的模仿和照搬西方的道路向着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各自国家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转变。

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 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1 年 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大型国际发展报告《不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在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开始复兴的气氛下 由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A·W·刘易

斯等人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认为，只要取得资本和投资就足以解决发展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一批有关发展的综合性论著相继问世。如 R·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年），A·W·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5年），H·莱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1955年），G·米尔达尔的《国际经济》（1955年）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58年）等。

这些论著所形成的共同的，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普遍模式，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 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是颇具影响的，也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一般都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一向经济起飞阶段过渡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大众消费社会，后来又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很显然，这位美国学者主要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物质消费水平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在这里，所谓发展问题，就是不发达国家沿着上述模式的各个阶段循序前进，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样一来，发展问题便被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也就被当作了经济增长的同义语。

这种发展模式较为典型地体现在联合国当时所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上。在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曾概括地指出：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变迁。这一广泛流行的发展公式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之所以形成，并非偶然。它是发展问题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和经济的落后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政治上获得了独立，此后，如何发展经济，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便成了这些

国家的首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之下，个个都想着现代化，但对现代化含义的认识却很模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成了现代化与发展的同义语。于是就形成了各式各样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诸如“工业化战略”、“赶超发展战略”、“按部就班发展战略”、“起飞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等。这种种战略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工业化，单一地追求经济的增长。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6%，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出0.6%。整个70年代，西方经济处于停滞的危机之中，增长率仅为3.1%，而发展中国家却保持着5.3%的增长率。这样连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已不再默默无闻。

1950年，亚、非、拉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而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到9.1%。到1978年，总产值上升到15.1%，人口比例占75%。在近30年的时间里，总人口比重上升5%，而总产值的比重则上升6%。广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应当说是令人鼓舞的，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进展。例如，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以工业品加工出口为主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运用了进口替代战略，高速度地发展了对外贸易，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1978年间平均增长率为7.4%，1978年人均收入已达3000多美元。又如非洲的象牙海岸，1960—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8%，197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169美元；阿尔及利亚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2214美元。在南美洲，则有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它们的人均收入也分别达到了1000美元以上，工业体系初具规模，成为准工业化国家，其中巴西的经济增长尤其引人注目，被称为“巴西奇迹”。其70年代

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9.4%，经济结构已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过渡。

在大国之中除了南美的巴西之外，亚洲的印度经济增长也是不容忽视的。印度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由于遭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经济十分落后，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1947 年独立之前，几乎无工业可言。在 50 年代、60 年代直到 1975 年的 25 年之间，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6.5 倍，1969 年已达 476.7 亿美元，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其科技人员在人数上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近 30 年历史记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并不仅仅是成功的。尽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 GNP 增长目标，但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一大堆问题和许多失败的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贫富收入的差距急剧扩大。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非但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的巨大苦难之中。如巴西 1977 年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452 美元的时候，占人口 5% 的富裕阶层获得了国民收入的 38%。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出增长的结果，是长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产出有快速的增长，但产出中相当大部分无补于国计民生，而是国民经济的虚耗，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平民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

第二 结构的畸型发展。比如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片面的工业化战略的推行，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忽视农业投入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加深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因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导致大面积粮荒和饥馑。很多国家的产业部门结构很不合理，仍停留在西

方世界原材料供应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地位。而面向国内市场的那一部分生产能力，又不能提供大部分居民所需要的产品，因而大多数国家还谈不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就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

第三，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中心的发展也受到资源的限制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这种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 就是以对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增长。例如，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 4.9% 但其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生产总量的 21.3%；1975 年 瑞典的人均国民收入在 8000 美元以上 他们有 1000 万人口 但其消耗的电力比当时拥有 6 亿人口的印度还要多。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和不可再生性，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长期实行这种以高耗能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战略。同时 片面的经济增长战略和技术装备的落后 导致了对于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使得持续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产生了诸多的弊端，70 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逐步认识到了尽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很难想像没有增长的发展，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实践，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视野的扩展，促使人们的发展观产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 发展是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 发展是多元的 包括多种多样的促成因素，其中社会的发展占有主要的地位。

发展观的转变使各种‘替代战略’和‘新的发展观’随之出现 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 1976 年国际劳动组织在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1970 年 10 月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的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 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要求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

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这种观点在随后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得到确认。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人类安全观”。

可以说，各种新的发展观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发展。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代表社会的、科技的、政治的、家庭的和个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不单单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应当是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发展可以视为社会发展的同义词。新的发展观从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发展转而也同时追求未来人类的发展。其中人的基本需求和人的发展是发展的中心目标。

二、从追求物的发展到 以人的发展为主题

与发展观的转变相适应，从追求经济增长或者说追求 GNP 增长转向追求人的基本需求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同样是一个重大转变，它意味着发展主题或者说发展目标的变化。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物质财富的规模增加、速度增长等方面，其发展的中心是经济总量，也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或是人均经济总量，其重心在于 GNP 的增长上。严格地说，这种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尽管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是体现在促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但是，这一最终目的并不是直接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而最多也是隐含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或是评价上，无疑，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忽视最终目的。

事实上，盛行了几十年的传统发展战略对于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条件的改善和人的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发展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后果。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结果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农业歉收，使 20 多个非洲国家因持续干旱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饥荒。过度的城市化与贫富不均使 60—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人口以年平均 15% 的速度增加 大量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使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收入下降。而且 传统发展观之下的经济增长长期偏离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为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想方设法生产汽车、空调、豪华住宅等高档消费品，而不是优先生产一般民众需要的商品，因此，这些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广大社会成员并没有从发展和增长中得到什么好处。

特别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冲突加剧，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人们处在高度紧张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精神高度紧张，人情关系淡漠，社会道德败坏，社会秩序混乱 形成了严重的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物质进步中的贫困”的社会现象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和进步 相反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却进一步恶化。

鉴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 年）计划”的经验教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概念，该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对这一概念作了阐述“1976 年的大会标志着教科文组织接受了一个新的发展概念，这个概念的思想从那时以来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发展是多元的；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唯一的内容，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

证特征^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观点指出了发展是多元的，也指出了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把人作为一切发展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赋予了发展以新的内涵。基本需求战略便是这种发展的具体体现。这一战略认为，如果不发达是指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状况，那么与此相对应，发展就是人的基本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演进过程，因此，能否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就成了评价发展与发达的准则。所谓人的基本需求，就是生活在各种文化与体制下的人所共同需求的东西，如衣、食、住、行、知识等一切生活必需品，它既包括生理的需要，又包括心理的需要。

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人的自由、尊严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满足基本需要的过程就是促进人的才能不断增长的过程，人的才能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基本需要的更大、更高层次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也是人在达到基本需要满足的同时，有能力满足更高需求的过程。这样，人的发展才能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断地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潜力的更充分的发挥。

新的发展观在关注当代人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未来，从单纯追求当代人的发展转向同时也追求未来人的发展。这一观点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新的发展价值观。

传统的发展观所造成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中，越来越受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失衡对生态系统所构成

阿尔杜·马赫塔尔·姆博：《人民的时代》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年版第96—97页。

的威胁。人类能够为工业化目标而垫付使用的环境潜力已基本使用殆尽。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敏感程度和选择权都普遍提高，人类再也没有充裕的环境容量可以大手大脚地利用，他们已经从客观事实中认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全球正面临着自我毁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持续发展是建立在新的发展观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理论，它是人类在 20 世纪对社会发展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持续发展”是 21 世纪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也是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持续发展最广泛的定义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这个定义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

第一 优先考虑当代人的要求 尤其是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持续发展注重现在 也就是说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意味着对后代人的剥夺。尽管人类未来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条件，但发展的重点应当是首先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第二 在生态环境可以支持的前题下 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也应关心未来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现代人的发展。持续发展强调保护生态环境 控制人口无限制增长 使环境和资源既应满足现代人的现实需要 又足以支撑后代人的潜在需求。

曲格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4 页。

三、发展道路从单一化到多元化选择

如何实现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对于这一历史性的命题，几十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自己坎坷的发展历程中逐步认识到，传统的发展道路，即单一的西化并不能引导它们走上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发达与繁荣之路。如何实现发展，必须选择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等相适应的新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路。

作为传统发展模式的代表性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发展的道路上，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一样，它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二者之间仅仅是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在发展道路上两者并无二致。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都要经历一个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这两种形态。发展中国家只要积极地全盘输入和引进西方文明，努力促成西化，就一定能够最终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实现现代化。

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

这一理论在论述发展与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大体勾画出了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但是，这一理论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由于其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的不同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多样化特征。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整体来说，仅是众多文明之中的一种类型，尽管工业革命之

后西方文明扩张到全世界，在世界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支配作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的确需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特点，走现代化、工业化之路。但是西方文明不可能取代各个国家具有自己特点的文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在自己拥有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进行，它们不可能“全盘西化”。而事实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南美、亚洲、中东与非洲都走上了多样化的道路。

其次，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现代化的先发效益，广大的殖民地为其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财富、广大的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西欧大量的过剩人口又被迅速地转移到了新开辟的美洲、大洋洲等地，从而减轻了压力。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大多数是从西方殖民统治下摆脱殖民地地位而走上独立道路后，才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他们不仅不可能以别的国家为其资本积累的来源，而且在摆脱为西方国家提供原料产品和消费品市场的地位方面也难以有所作为，在相当的时期内难以消除殖民统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时，其人口就已经过剩，而且经济每增长一步都伴随着一次人口的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即使生产力提高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使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无几。

再则，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信仰也和当时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工作态度，甚至对成功的态度也与西方大异其趣。物质进步相对是较易成功的，但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念却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处的不发达

状态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从未经历过的，他们的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曾面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

当然，以西方工业革命发其端的现代化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充分表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进程和共同特征，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在肯定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影响的基础上，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根据近百年来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逐渐确定的实践，概括出了多种不同特点的发展模式，比如依附理论与巴里洛克模式、内源发展模式、整体发展模式等等^①。同时，在社会发展的实践模式的概括中，学术界根据各国现代化启动的时间，启动的原因、方式等，把现实的社会发展模式划分为三大类型：“先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和“后发内生型”。

总之，与新的发展观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无论从理论家所概括总结的有关发展道路的理论模式上，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选择方面，都已成为新的潮流。

四、中国小康社会与新的发展观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发展的观念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发展本身也带来了发展观念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看，新的发展观念是人类社会对 20 世纪发展的经验教训

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93 页。

的总结、反思和创新。新的发展观也为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框架和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小康社会是新的发展观念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与人的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也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更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仍然是小康社会的必要前提。我们说从传统的追求 GNP 增长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 GNP 增长的全面否定，而只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前提与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什么都无从谈起。同时，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作保证，经济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人的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中国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从发展的目标上看，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中国小康社会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人的发展为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并不是很高，但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与人的发展为目标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反，二者互为因果，是一体化的，也是相互促进的。把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突出了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则是满足人的基本要求与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性阶段，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增长来衡量，它包括了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会秩序等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质量的提高 人民安居乐业 生活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 这正是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表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 用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项指标来推算人文发展指数，对世界上 17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其结果表明，1992 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第九十四位，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高 49 位 属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这表明 中国社会人文的发展比之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位置更突出一些。

中国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社会。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的真正实力，以及确立其在国际局势中的位置的主要的综合性标准。综合国力不是单一的指标 它包括了资源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也就是说 单纯的经济力量大小并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可以动员起来投入社会发展，施加国际影响和进行国际抗衡的综合力量，是一个国家的地理特征、人口规模、资源丰度、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财政力、军备状况、人才资源、领导能力、民族特征、社会安全程度、政治动员力、生活稳定性、国民士气、政策和战略选择能力等的整体性力量的综合表现。

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迥然相异。所以说 新的发展观对于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是重要的 只有社会的多元发展 综合发展 整体发展 才能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国的综合国力 1949 年在世界名列第十三位，1988 年上升到第六位 预计到 2010 年小康社会时 包括港、澳、台 综合国力可望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 中国小康社会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发生重大转变 传统的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主要依